



### 林语堂的“趣味课堂” 江舟

林语堂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学者、翻译家、语言学家,他早年留学美国、德国,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,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。回国后在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厦门大学任教,曾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

接着他将话锋一转:“花生米又叫长生果。诸君第一天上课,请吃我的长生果。祝诸君长生不老!以后我上课不点名,愿诸君吃了长生果,更有长性子,不要逃学,则幸甚幸甚,三生有幸。”学生们哄堂大笑。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:“请吃!请吃!”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。课程结束,林语堂宣布下课,夹起皮包飘然而去。此后,每逢林语堂讲课时,总是座无虚席。

上课从不正襟危坐,有时坐在讲台上,有时坐在椅子上,将双脚放在讲台上,笑语连篇,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。学生们也都情绪轻松,乐之不倦。林语堂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,而是“相面打分”。他记忆力极强,几节课下来,便能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,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,因此,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,他都了然于胸。到学期结束前,林语堂便坐在讲台上,拿出学生名册,一一唱名,被点到的学生,依次站起,他如相面先生一般,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一眼,便定下分数。如果没有把握,他就让学生到讲台前,略为谈上几句,然后定分。薛光前说:“林教授打下的分数,其公正程度,远超过一般以笔试题命题计分的方法,所以在同学们心中,无不佩服。”

### 选官重文凭始于唐 赵柒斤

宋代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七十八之“贡举一”开篇说,进士科起于隋文帝大业年间,到唐太宗贞观、唐高宗永徽年间火爆起来。以至于出现不论官职有多高,“不由进士者,终不为美”的现象。这说明,自唐朝考试,“进士”身份不仅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,更为当时社会认可度最高的“文凭”和“学历证明”。

唐朝学子一旦拿到“进士文凭”,立刻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即便有张仪、苏秦那样的口才,荆轲、聂政那样的胆量,仲由(子路)那样的勇武,张良那样的智谋,东方朔那样的诙谐搞笑,在“进士”面前,也都黯然失色。由于唐朝科考进士录取率较低,考取进士就可能坐上显赫高位的概率便大大提高,进士出身“位极人臣者十有二三,登显列十有六七”。于是,考生呼吁提高主考官品级,唐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考场发生的“两季事件”促成了考生心意,科举考试改由礼部主持,礼部侍郎(正四品下)担任主考官,此后便成定制,直到1905年科考废止。

诚然,科举制替代魏晋以后选人用人的“九品中正制”,摧毁了权贵世袭及官僚机构“举荐”选才制度,无疑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。尤其自北宋始打破出身、贫富等限制,不拘一格科考选才并屡次“扩招”,不仅让有才的贫寒之士脱颖而出,推动草根阶层向上层社会的逆袭,也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文明发展。

然而,做官一味追求“进士文凭”,既封闭了人才渠道,又造成官官相护、拉帮结派等弊端。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肇一针见血地指出,人们太看重进士文凭,“是故俊人由此出者,终身为文人。故争名常切,为时所弊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引用《唐摭言》《嘉话录》《玉泉子》《独异志》等唐代史料笔记,分8个篇章精选了唐代“贡举”及“铨选”的小故事,今天读来仍令人深思、发人深省。

唐代著名诗人、水墨山水画派鼻祖王维走了一条捷径,他疏通李隆基最信赖的胞妹玉真公主后,“公主则召试官至第,遣官婢传教,维遂作解头,而一举登第矣。”杨国忠的儿子杨暄科考成绩不及格,未被录取。主考官、礼部侍郎达奚珣“恨国忠而未敢定”,便让时任会昌县尉的儿子达抚带着亲笔信上杨府解释。达抚告诉杨国忠:“相君之子试不中。”杨国忠勃然大怒:“我儿何虑不富贵,岂籍一名,为鼠辈所卖!”达奚珣越想越怕,“因致(杨)暄于第”,不仅乖乖地录取了杨暄,连进士也非常靠前。

“牛李党争”中“李党”领袖李德裕没有“进士文凭”,故“恒嫉进士举者”。他做宰相后,“抑退浮薄,奖拔孤寒”,从不跟京城才子们来往。唐武宗会昌三年(842年)科考放榜前,主考官王起按规定向他请示,李德裕竟直接将江西宜春为当时认识的卢肇等3人定为状元、榜眼和探花。

1300年间科举制产生秀才、举人数以百万,而录取的进士不到10万人。能过五关斩六将拿到“进士文凭”的,多数人并非等闲之辈,但像唐代那样通过各种舞弊手段博取“进士文凭”的也大有人在,导致古代官场上大搞人身依附、拉帮结派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,像蔡京、秦桧、严嵩等“进士”出身的大贪大恶,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。由此可见,选官重文凭,追求高学历的同时,必须匹配高素质、品德及实际能力,否则则会贻害无穷。



### 大家风采



### “闲聊”中呈现出的为人与为文 张达明

张达明

崔道怡先生曾任《人民文学》编审、常务副主编,用出版家张守仁先生的话说:“他是一位极有鉴赏力、极敏锐、经验极丰富的编辑大家。他是在自来来稿中发现当时下放在张家口,住在羊圈里干活、一直无人理睬的汪曾祺写的小说《羊舍一夕》,如同泥沙中拣到了金块,欣赏备至,便刊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汪曾祺感激道:‘我的作品能够得到老崔的欣赏,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。’”不仅如此,他还发现培养了李国文、蒋子龙等大批作家,责编了《山那边人家》《班主任》《西线无战事》等大量佳作。

张守仁在《名作家记》一书中,记述了他与崔道怡之间的一次“闲聊”:1996年4月30日,两人同游井冈山,入住井冈山市杜鹃宾馆。当天傍晚下了场春雨,借着雨后清新的空气,张守仁约崔道怡到外面散步。两人边走边聊,张守仁问崔道怡:“你几十年来一直看小说稿,有什么经验?”崔道怡说:“要说经验的话,我也是根据多年来阅读和编辑的体会,总结出五个字,即人、情、事、理、味。用以检验小说的质量。人,就是人物;情,就是感情;事,就是故事、情节;理就是内涵、意蕴、哲理或思想;味,就是味道,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,浓缩着密集的美感信息。”

张守仁赞赏道:“这‘五字诀’真精彩。尤其是这‘味’字,就好比有人把粮食酿成了酒,更把酒酿出了浓香。”

崔道怡说:“文坛就应像花坛一样,花团锦簇,自由绽放,各呈异彩。”

张守仁说:“现在的热点是长篇小说。长篇小说当然重要,其实短篇最难写,现在好的短篇小说太少。”

崔道怡深有同感:“现在的短篇大都质量差,且越写越长。鲁迅的《孔乙己》只有2800字,用了4个细节:一开始写孔乙己穿着长衫站在鲁镇酒店曲尺形柜台外喝酒;第二个细节是他说茴香豆草头下面的‘回’字有四种写法;第三个细节是他给每个孩子分一颗茴香豆,孩子们不走,他连忙用手罩住碟子,说:‘多乎哉,不多也’。最后写他穿件破棉袄,盘着的两脚下面垫个蒲包,一副落魄相。这样一写,活灵活现,千古不朽。”

张守仁说:“孔乙己这个名子和他说的‘窃书不能算偷’已成了全民口头上的语言,北京开了咸亨酒店,绍兴甚至成立了孔乙己饮料公司,可见这个短篇影响之深广。”

崔道怡接过此话题继续说道:“要是现在有的作家写这个题材,为了稿费,可能会把2800字拉长成28万,其中还少不了爱情和武打。比如孔乙己在何家抄书,就添个丫鬟,让他和丫鬟产生缠绵、曲折的爱情。孔乙己偷了举人家的书,被人发现,展开一场激烈的武打,结果被打折了腿……如此掺水地写,有什么味道呢?短篇就是要短,要精炼。”

散步结束后走到宾馆大门前时,崔道怡突然站住对张守仁说:“我总猜想鲁迅先生早年,在绍兴街面上确曾看见过一个穿长衫的人站着喝酒,并给孩子们分茴香豆的情景,多年后触发他写出《孔乙己》这个名篇。”

关于这次“闲聊”,张守仁在《名作家记》中说,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“闲聊”,其实是崔道怡“为人与为文的具体呈现,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……他给我的印象是,他犹如飞翔在云端、振动双翼、伸直两足、姿态优雅地向前挺进的领头鹤,用它的慧眼锐利地寻找、发现大地上的一切佳品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赵瑜、徐剑、凸凸们称他是‘国编’,认为他是首席小说编辑家、‘文学摆渡人’——我们这个职业行当中至高无上的称谓。”



绚丽色彩 张成林摄影

### 丰盈苦瓜 王晓阳

王晓阳

每年夏天,父亲总要种上几棵苦瓜,任其攀援竹架,伸出绿色的手掌,绽放满满一架黄色的花朵,结出表皮凹凸似佛头的苦瓜。

父亲说:“苦瓜全身皆苦,吃起来就想起过去的苦日子,拌一盘儿,忆苦不忘本。”父亲这番话不知说了多少次了,母亲有时听得不耐烦,就奚落他:“老头子,又在念你的苦日子了,何时是个头啊!”父亲苦笑着,仿佛一根历经沧桑,如假包换的苦瓜。

父亲出身于兵荒马乱的旧中国,缺少穿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还整日担惊受怕,苦不堪言。如今,日子越过越红火,叫他如何不感激新中国,感激共产党啊!父亲常说,做人不能忘本,苦瓜就是他不忘本的药引!我深受教育,沐浴着党恩,努力工作,现在已是一名共产党员!

对于苦瓜,母亲也不反感,反而十分喜爱,这源于我的一次“苦夏”。

那年夏天,我食欲不振,脸颊密布大大小小的青春痘,烦恼不已。母亲带我求医,医生说是苦夏,平时要多吃苦瓜,还开了一点药。

母亲牢记医生的嘱托,把吃苦瓜当做头等大事。清炒苦瓜片、鸡蛋炒苦瓜、瘦肉苦瓜汤……凡此种种,每顿饭,不管主食吃啥,母亲总要做一盘苦瓜,谆谆告诫:医生说的,祛痘、开胃要多吃苦瓜啊!

那时的苦瓜,宛如一贴膏药粘在我的饭碗里,嘴巴一碰碗沿儿,就想吐,吃不下啊!这可急坏了我妈!她四处求教如何去掉苦瓜的苦味儿。却一直没讨来方子,急得嘴唇起了泡。我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大口大口咀嚼苦瓜。说来也怪,吃多了,也不觉其苦了!林清玄说:“我从小嗜吃苦瓜,不只是苦瓜的滋味深长,也是感动于苦瓜的身世,更是觉得苦瓜的一生充满了禅意。”于我,感受到的是母亲深深的爱意!

苦瓜虽苦,却是一味良药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其“去邪热,解劳乏,清心明目”;《滇南本草》称苦瓜能“泻六经实火,消暑,益气,止渴。”苦瓜切片晾干,做成苦瓜茶,味道独特,功效不减。母亲每年都要做一些苦瓜茶,放在茶罐子里储存起来,以备冬春季节饮用。

如今,我外出工作,远离故乡,远离白发苍苍的双亲。而双亲总是惦记着我,惦记着我的儿女。每年夏天,总要寄一些苦瓜茶给我。每次我捧着这些跨越千山万水带着父母余温的宝贝,总能感受到上面的深情和牵挂。

我现在习惯了午后或者夜晚,泡上一杯苦瓜茶,雾气袅袅中,望着一片片苦瓜胀大,渐渐恢复生机。我细细品味,感觉人生的幸福和无奈。苦瓜年年新生,父母却已老去,我暗暗下定决心,要早一点回到家乡,常年陪伴年迈的双亲左右,还要年年种植一墙苦瓜,收获一生的幸福!

### 美轮美奂沈寿绣 程应峰

程应峰

辛亥革命后,农工商部绣工科解散。在她的倡导下,江苏苏州、南通、丹阳、无锡、常熟等地分别举办了刺绣传习所、绣工科、绣工会等。她曾先后到苏州、北京、天津、南通等地课徒传艺,培养绣艺新人。1914年8月,受南通张謇聘请,余沈夫妇同往南通。沈寿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兼刺绣教员。后来女工传习所改名为绣织局,沈寿任局长。她除了向学员教授刺绣技艺,还要求学员学习现代绘画知识,掌握光影效果对作品的影响,她说:“昔之绣花卉无阴阳,绣山水亦无阴阳,常有一枝之花而数异其色,一段之山,一本之树,而歧出其色者,籍堆垛为灿烂焉耳,固不可以绣有笔法之画,与天然之景物。余憾焉,故不敢不循画理,不敢不师真形,虽谓自余始,不敢辞也。”她继承传统并吸收日本绣法和西洋画、照片的明暗原理,注重物象的“逼真”和立体感。正因如此,她的作品被誉为“仿真绣、美术绣”,她本人也被誉为“绣圣”。除获奖作品外,她的《英国女皇肖像》《基督受难图》《万年青》《花鸟册页》《观音像》《文蛤图》《柳燕图》等,均受到各方人士高度评价。

沈寿与张謇共同完成的刺绣理论著作《雪宦绣谱》,对前人的针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,总结了刺绣中常用的18种针法,填补了刺绣针法研究空白。同时,首次将西洋油画的光与影在中国刺绣上予以运用,彰显了仿真绣的艺术特色。她在《雪宦绣谱》中说:“我针法非有所受也,少而学焉,长而习焉,旧法而已。既悟绣以象物,物自有真,当放真,既见欧人铅油之画,本于摄影,形生于光,光有阴阳,当辨阴阳,潜神凝虑,

以新意运旧法,渐有得。”美术大师刘海粟曾说:“中国第一个画素描的,不是我刘海粟,而是沈寿。她是用绣针画出的素描。”

沈寿曾这样阐述光与色的运用:“面光者色浅,背光者色深,侧者酌深浅之中以取和。”“言乎色,若余绣耶稣像摹本油画,绣意大利皇后像摹本铅画,皆本于摄影。影因光异,光因色异,执一色貌之而不肖,潜心默会,乃合二三色空于一针,肖焉,旋悟虽七色可合和也,分析之虽百数十色亦合和而和也,故曰:色之用无定也。”她的意思是说西方油画、铅画、摄影因受光不同,产生明暗变化,仅用一种色线表现,达不到仿真效果。以故,沈寿潜心研究,用几种色线合并于一针来润色调绣,丰富了色彩的表现力。也进一步说明颜色的使用必须和谱统一,灵活多变。

沈寿在绣艺上独创的“仿真绣”,以新意运旧法,显光弄色,参用写实,针法多变,富立体感。沈寿绣吸收了油画艺术的用光用色,结合中国传统刺绣技艺,绣线采用天然蚕丝经过特殊的染练工艺而成,其技艺要求极高,仅用一种色线表现,达不到仿真效果。沈寿潜心研究,用几种色线合并于一针来润色调绣,丰富了色彩的表现力。也进一步说明颜色的使用必须和谱统一,灵活多变。